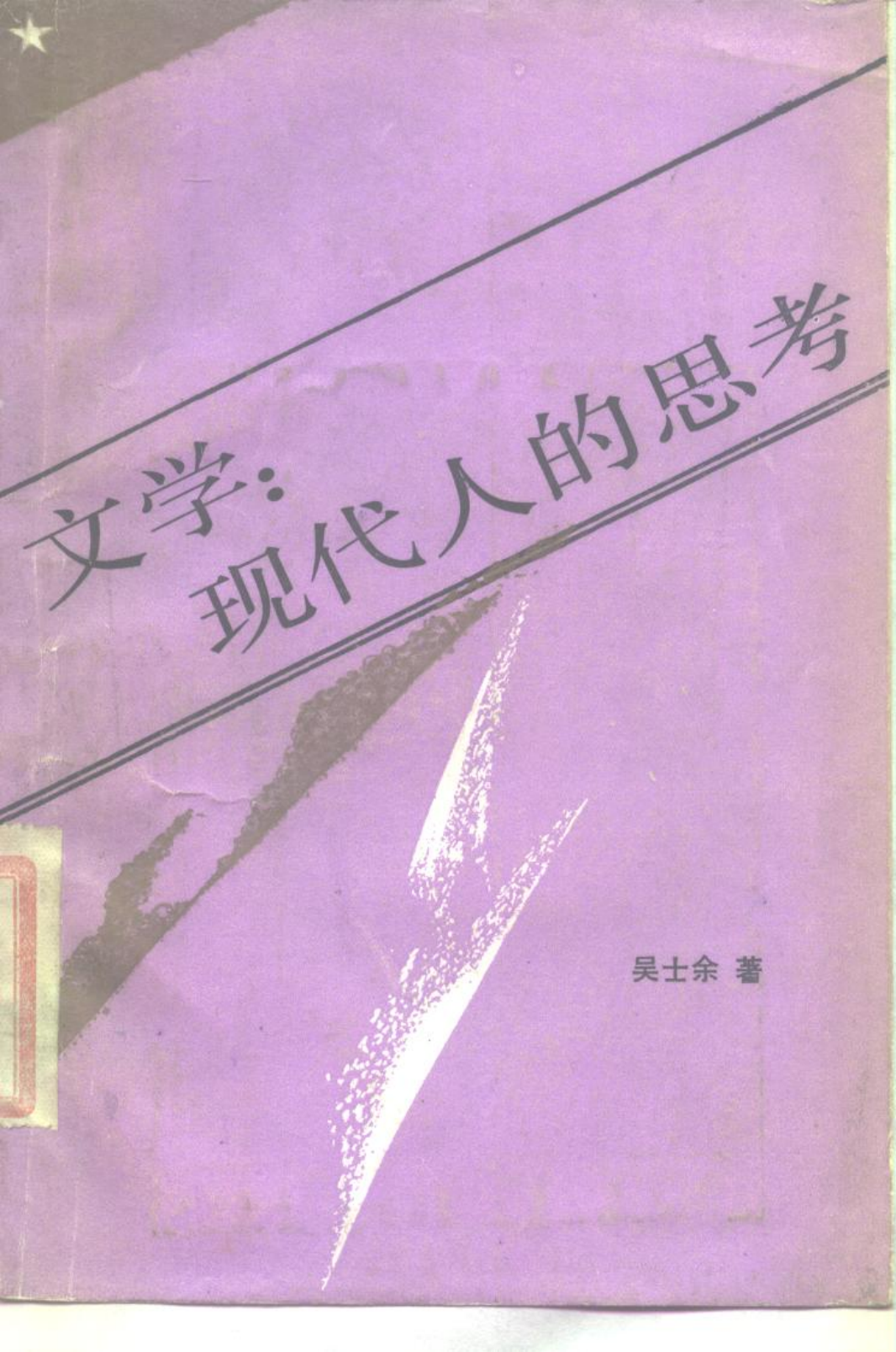




文学： 现代人的思考

吴士余 著

文学：现代人的思考

吴士余

中国展望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余 人
封面装帧 王沙城

文学：现代人的思考

吴士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625

208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1—8,000册

统一书号：10271·021 定价：2.21元

序

· 徐中玉 ·

我读过士余同志的《野草集》，内容丰富，他在《后记》里却说这“只是一丛绿色的野草，不能登文艺论坛的大雅之堂”。“诗无达诂”，过去曾被目为“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仿佛文艺评论也必须“一刀切”，根据某一个谁的“金口玉言”，一锤定音，便作为“达诂”来使芸芸众生遵循。如果哪一位不识时务，偏离或有违了这种“达诂”，的确曾有一个时期决不会被看成香花，而僵硬的逻辑甚至会作出非香花即毒草的结论。在那种时候，仅仅被当作野草，不受重视，由你自生自灭，还算幸运的呢，而在未必合于那时所谓“达诂”的野草自己，如果真是有知，我看实在也大可不必为未能登上当时的那种“大雅之堂”自惭形秽，感觉寂寞的。野草虽

野，伴侣却最多，寒冷、冰雪可以暂时把它窒息，一阵狂火也可以把它的叶子烧尽，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比养在玻璃房子里的高贵花草往往更有生命力。现在各种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创作繁荣，评论活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一言堂”、“个人拍板”的做法被否定，“一刀切”的做法实际行不通，“野草”与一切似乎封定的香花、家草开始都可以平起平坐，平等地商量讨论了，应该说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文艺理论研究界的一件空前的大喜事。作品在人民大众中的持久生命力是衡量其崇高价值的唯一标准，而这种强大生命力即使在今天开始真正清明起来的时期里，我觉得也还是同“野”气有密切联系的。太文雅就会流于萎弱，太官气就易流于文饰，保持点山野之气——农村市井小民的愿望与呼声，或者说人民群众的一点批评精神吧，我以为是太重要了。岂不是，发展前进的道路永远不会有尽头吗？如果从这点来说，我不仅认为士余同志完全不必以“野草”自谦，倒还最好进一步以“野草”来自励，更多地发挥出野草精神，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建设，作出更多更积极的贡献。

士余同志近年来又写了很多论文，现在又可以结成新的集子出版了。我敬佩他的勤奋，前面所讲的一番话也许仍不妨继续赠送给他。我对年正富、力正强的同志们的努力成果总是抱着最为

喜悦的心情来拜读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比前一代强。

士余同志知识面广，古今中外，常能交叉比较而谈。这是一种必要的修养，也是一种好的研究方法。古今中外是一方面，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知识的相互渗透、融会贯通是另一方面。我国古人，除文学创作外，也尽多兼通文武，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医卫之学的能人。苏轼是一个，诸葛亮更早。他们不可能象现在人这样能讲出为什么应该这样努力的科学理由，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出了成绩。不知是谁说的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记得是幼时老去一家“剃头店”理发时从对联上开始看到并记住的，现在年过七旬，倒越来越觉得它的深有意义了。“世事”范围该多大，何止“阶级斗争为纲”，天外还有天，原子之内还有更小更小的什么子什么子哩，而世事同人情也何尝可以截然分为两橛。文学是人情之学，我们评论工作者过去对人情的理解，现在想来实在近于按图索骥，根据规定格式办事，距“练达”的境界甚远。我自知知识既老又窄，必须改造结构，才有寸进，对年富力强的同志们，就不免更寄着这种期望了。改革的大业使我们不能不紧迫地感到这种需要。比起在过去那些沉重而又无望的日子里我们承受过的一切劳累和无聊得同样要命的负担，这应该是有天差地

别的愉快的任务了。

我期待着并相信着士余同志的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5年7月26日

前 言

文学创作，是用形象思维对生活作出判断和评价；文学理论，则需要用逻辑思维对创作进行概括和探索。

当代社会的变革和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会给作家带来创作上的灵感与迷惘；观念更新和纷繁杂沓的文学现象也会给评论家带来理论上的困惑和突破。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文学对现代人提出了严峻的历史使命：思考。

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既浅鲜又散杂，未能对目前出现的新的文学观念和现象作出清晰的梳理和系统的理论研究，仅仅是通过几部作品的评析，几个作家创作的断想，对文学创作的思潮、趋向和得失发表些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本书侧重于当代文学的思考。诸如，《新时期小说的史诗化趋势》、《现代审美意识的新层次》等

文章，对当代文学观念更新所引起审美思维的层次变化，作了一些尝试性的思考。《文学的人生模式》则通过对工人作家唐克新的创作，来概括当代工人文学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反映生活、表现人生的不同模式，从中探寻工人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席勒式”与文学现代化》涉及了促成当代文学观念更新的外来文化背景——现代派文学思潮。文章对学术界盛行的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之说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只因知识浅薄，姑且妄言为之。当然，对文学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对文学观念的探索，它还应包括对诗歌美学、小说美学等领域的求索。1958年的新民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曾给新诗创作以较大冲击。在当时，有些论者对它作出了偏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总结。随着历史的反拨，这个文学思潮又遭到了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我以为，作为诗的艺术美学有其客观真理性，对它的思考应该抱着唯物主义的态度，新民歌创作也不能例外。《对新民歌中“二结合”的反思》就抱着这个宗旨，来澄清新民歌的一些自身规律。微型小说的崛起则是八十年代小说美学的新趋向，《微型小说：叙事文学的特殊体制》就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渊源、形象特征、艺术形式的演变作一宏观的概括。其中，不乏“出格”之言，期望同行的批评，以求得真知。

文学的思考，不应割断历史，忽视、偏废现实

主义的传统。每部文学作品总有其特定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意识，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思维方法来总体考察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体现和它们的异同，这对宏观研究现实主义小说美学传统及其发展轨迹无疑是必要的。《近代长篇结构模式的比较研究》就选择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欧洲近代长篇结构的相似审美特征来考察这一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客观规律，以及受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而显现的不同发展趋向，现实主义传统在小说美学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思考，并不是积沉后的理论总结，因此，认识肤浅，论述欠当，也在所难免了。

本书还对世界文学史上曾影响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名著和作家进行再认识和再评价。这一再认识过程，自然也离不开对文学的思考的。在写这些文章时，笔者试图站在现代人的艺术视野上，从不同审美范畴对早有定评的名著进行重新评说，或是立足于道德的评价，或是侧重于社会与历史的分析，或者是着重对作家审美品性、对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出一些与传统观点相悖的见解。其效果如何，还得由读者评说。

我认为，对文学的思考，并不羞于知识的浅薄和思想上的幼稚，重要的是真实，不做任何掩饰。尽管它是欠缺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经过思考者的认真思考，毕竟向真理迈进了一步。

如果说，这本小册子有可能变成铅字，那就是：它客观地记录了我对文学思考和求索的真实印迹。

吴士余

1985 年 10 月于上海

目 录

[1] 序

徐中玉

[1] 前言

[1] 新时期小说的史诗化趋势

[26] 典型化法则的再思考

[44] “席勒式”与文学现代化

[56] 创作失误与作家的审美趋向

[76] 文学：现代人的思考

[94] 探索中的彷徨

[101] 现代审美意识的新层次

[111] 文学的人生模式

[125] 英雄形象的构筑与作家的个性

[151] 微型小说：叙事文学的特殊体制

[176] 诗的美学：时代感、战斗性、诗意美

[195] 对新民歌中“二结合”的反思

-
- [213] 台湾乡土文学摭拾
[228] 近代长篇结构模式的比较研究

[256] 神圣道德的叛逆与沉思
[278] 社会生活和政治的镜子
[294] 诗人，应是时代的产儿
[310] 寓言，裁判生活的真理

新时期小说的史诗化趋势

近几年来，小说（本文限指中、短篇）的思维结构出现了由单一美学层次（故事化的叙述）向多元美学层次（如：形象的性格化展示，系列形象展示，形象的象征化展示，心理形象的审美展示等）发展的趋向。作为小说艺术体系的矛盾运动规律的一种反映，它显示了小说文体演进的历史趋势。对之，也引起了小说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有的同志对小说思维结构的审美趋向，作了大致的概括和分类。他认为，当代小说在艺术展示方面，已形成了三种基本模式：（1）“传统式——重情节，讲究剪裁”；（2）“表现式——写意与工笔相匹配”；（3）“思考式——角度独特，意旨含蓄隽永”。^①这种分类虽有其合理性，但难免失之简单化。就新时期小说创作而言，不少作品的思维结构是多元的。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它既有故事情节的叙述，又有小说意境的开拓。显然，这篇小说是兼集“传统式”与“表现

^① 张春生：《关于中篇小说的简单思考》，《青年评论家》1985.4.10。

式”于一身的。宗璞的《我是谁》，王安忆的《雨，沙沙沙》，除了偏重形象的思辨性和象征色彩外，又强调着心理结构的时空效应。这就很难归入“思考式”或“表现式”中的哪一类。可见，仅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分类，是难以准确阐明当代小说思维结构趋向的审美品质的。要考察这一审美趋势，并尽可能作出科学的界说，应该从解释“美学体系中类型学的共性的本质及其稳定性”^①入手，去寻找它的规律。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以为，新时期小说的思维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二种新趋向：一是诗化，二是史诗化。前一种审美趋向主要表现为：作家侧重对艺术形象的情感分析和对社会生活的诗化描述，以诗的意境构筑和象征化的形象思维组成小说构形的主体。后一种趋势则不然。它继承了小说叙事性的传统，但又突破了传统思维结构的时序性，把小说创作的注意中心，从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过程描写（这是传统史诗小说的共性）转移到对艺术形象性格内涵和内心世界的历史分析。这两种趋向反映了作家在表现生活的范围和艺术情致上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它们作为新时期小说思维体系的两种不同类型，均有其稳定性。对小说的诗化趋势，笔者已在《艺术形象的象征化》^②、《小说意境的开拓与形象美感的诗化》^③等文中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只就“史诗化”审美意向作些尝试性的思考。

① [苏]P·科米娜：《论苏联文学中流派的多样化》。《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载《小说评论》1985年第3期。

③ 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4期。

小说史诗化的界说

什么是小说的史诗性？

对之，小说理论尚未下过明确的定义，然而，亚里士多德与果戈理的见解却得到了人们的公认，并视为一种法则。

亚里士多德说：“史诗的情节也应象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象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当然，“史诗不应象历史（按，指编年史）那样结构”，它的长度“须使人从头到尾一览而尽，约等于一次听完的一连串悲剧”，并“用不同的穿插点缀在诗中”。①

果戈理说：史诗中的“主人公永远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和很多人物、事件和现象发生联系和接触；必须能够环绕他描绘他的整个时代。史诗不能只写出几个特征，而是要包括整个的时代；史诗的主人公必须能够按照当时人类的思想、信念和意识的样式去行动。整个广大的世界都为这个主人公照耀起来了”。②

据我个人理解，这些论述已从两个方面对“史诗性”作了概括。一是史诗的审美品质。就其本质内涵而言，史诗

① 《诗学》第23章。

② 引自季摩菲耶夫《文学发展过程》。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

性应构成于：(1)严肃的社会主题；(2)人物形象须与社会、历史有着广泛的联系；(3)能反映整个时代；(4)对艺术形象、环境的描写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二是史诗的审美形式。一般地说，史诗的形式表现在：(1)情节叙述的连续性和时序性；(2)以个人命运为主体的结构模式；(3)纵横曲直的情节表述。应该说，两位大师的创见是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地执偏于史诗化的审美形式，忽视了它的审美品质的内涵，结果，把小说史诗性与小说叙述的“长度”简单地划上等号，从而导致了“史诗性”只存在于长篇叙事文学体裁之中的传统观念。例如，别林斯基就认为：“我们时代的史诗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包括史诗底类别的和本质的一切征象”^①。在我国理论界，也有同志认为：“由于短篇篇幅短，必然是人物少，情节单纯。尽管它可以含蓄，但底蕴终嫌不足。而长篇总的说来，是靠史家的笔墨来写生活。它反映生活呈现历史化，所以可以出现‘史诗式’的作品”^②。我觉得，这一传统的小说观念有其片面性。长篇小说可以成为“史诗”，但“史诗”不一定是长篇，它不成立逆反定理。传统之说，只看到了小说思维结构类型在形式上的稳定性，却忽视了史诗类型的审美品质内涵以及结构形式变化、更迭的复杂性。随着当代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创作方法、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小说史诗化的审美品质不仅客观存在于短篇小说(也包括中篇)体裁之中，而且已构成了一套新的思维结构模式。它作为一种文学主潮明

① 别林斯基：《诗底分类和分型》。《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79页。

② 张春生：《关于中篇小说的简单思考》。《青年评论家》1985.4.10。